

郑伟章 著

書林叢考

(增补本)



岳麓書社

郑伟章 著

書林叢考

岳麓書社

(增补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丛考:增补本/郑伟章编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7

ISBN 978 - 7 - 80665 - 964 - 9

I. 书... II. 郑... III. 古文献学—中国—文集

IV. G25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9903 号

书林丛考(增补本)

作 者:郑伟章

责任编辑:饶 毅

封面设计:莫 彦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21.5

字数:580 千字

印数:1—4,000

ISBN 978 - 7 - 80665 - 964 - 9/G · 634

定价:40.00 元

承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题 记

此集多系鄙人读书时随手所撰丛考,虽为竹头木屑,弃之可惜,尚祈小补小用于世。如廿多年前撰《唐集贤院考》一文,系统考证了这一机构之设立、职能、职官、地点和藏书、校书、编目等活动;关于慈溪郑氏、杭州鲍氏、常熟张氏、苏州潘氏、金山钱氏、贵州莫氏、巴陵方氏、绍兴徐氏兄弟、贵池刘氏、武进陶氏等,亦一一考证其藏书、刻书、校书、编目及其家族世系等史实;扬州徽商江春之家世、与清高宗之密切关系及其藏书、刻书和受命为四库馆征书,亦详考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又,关于问世已 130 年的张之洞《书目答问》的上百次版刻和校补情况以及该书著作人归属问题,亦作了详细考察和分析;首位蒐聚中国文献家史料的开山鼻祖、《藏书纪事诗》的作者苏州叶昌炽先生,逝世已 90 周年,鄙人首次为之撰写了《叶菊裳先生年谱》;尤其详考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 90 位献书人,一一为这些献书人撰写了考据性文字,并将《总目》所著录各家书目附于其后,以便学者参考,等等。

《书林丛考》1992 年由一家出版社梓行以来,颇受读者错爱。有的学者掷函说,获读此集,“为之狂喜”,书中大量史料既不见于《清史稿》,亦不见于《碑传集》,别开蹊径,所得独富。然当年仅印千册,很多人反映难以觅购此册。于是,笔者应这些读者之请求,

在前集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增益、修改、补充,其篇幅和内容大大超出了前集。因与原出版社合同到期,今改由岳麓书社出版此增辑修订本。

书中错讹难免,尚祈通人不吝赐教(请函寄:北京市西城区草岚子胡同三号,邮编:100034)。赘此数语,是为题记。

作 者

2008年3月20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古文献及文献家丛考

隋炀帝与藏书事业 / 3

唐集贤院考 / 17

唐代藏书机构考 / 48

唐代的书籍及其装帧 / 62

郑氏二老阁刻书考 / 67

鲍廷博知不足斋刻书考 / 74

搜奇揽胜到东瀛的《知不足斋丛书》 / 84

张海鹏、张金吾叔侄刻书藏书考 / 91

常熟南张文献世家世系考 / 106

稿本《香雪草堂书目》、《西圃藏书目》的著者及其世系考 / 120

金山钱氏刻书考 / 137

莫友芝的藏书和目录学 / 147

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刻书考 / 159

绍兴徐氏兄弟藏书考 / 173

徐友兰铸学斋刻书考 / 190

刘世珩聚学轩刻书考 / 200

陶湘涉园藏书刻书考 / 211

天然小筑在城闾 / 219

纪晓岚与阅微草堂 / 223

记文献渊薮顾廷龙先生 / 228

《文献家通考》的撰写及特点 / 235

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 / 244

《书目答问》版刻、校补纪略及著作人归属问题 / 282

明清奏疏题跋记一组 / 301

一、《粤西奏议》 / 301

二、《抚蜀奏议》 / 305

三、《抚夏奏议》 / 307

四、《海防奏疏》暨《抚畿奏疏》 / 310

五、《三抚密奏疏稿》暨《三抚捷功奏疏》 / 313

六、《按闽奏议》 / 315

七、《千山奏牍》 / 317

八、《平蛮奏疏》 / 325

九、《抚闽奏稿》 / 326

十、《都兴阿奏稿》 / 328

十一、《陕甘总督奏稿》 / 329

十二、《鸦片战事奏档》 / 330

十三、《清两湖总督两广总督奏议》 / 332

论读书与书目 / 335

叶菊裳先生年谱 / 342

第二部分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丛考

前言 / 397

“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 407

“编修查莹家藏本” / 424

“庶吉士蔡廷举家藏本” / 426

“兵部尚书蔡新家藏本” / 426

“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 427

- “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 428
- “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 / 430
- “编修陈昌齐家藏本” / 431
- “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 432
- “大学士程景伊家藏本” / 441
- “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 442
- “庶吉士戴震家藏本” / 442
- “礼部尚书德保家藏本” / 444
- “兵部员外郎丁田树家藏本” / 445
- “翰林院笔帖式都保家藏本” / 446
-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 446
- “内阁中书方维甸家藏本” / 473
- “编修戈岱家藏本”或“御史戈岱家藏本”或“监察御史戈岱家藏本” / 475
- “御史戈源家藏本” / 475
- “刑部员外郎顾葵家藏本” / 476
- “刑部尚书胡季堂家藏本” / 477
- “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 479
- “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或“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 / 486
- “两淮江广达家藏本” / 494
- “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 497
- “侍郎金简购进本” / 498
- “礼部侍郎金甡家藏本” / 500
- “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 501
- “编修李潢家藏本” / 503
- “广东潮阳县知县李文藻家刊本”或“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 505
- “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 508
- “编修李中简家刊本” / 510
- “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 510

- “太常寺卿倪承宽家藏本” / 515
- “庶吉士梁上国家藏本” / 516
- “编修林澍蕃家藏本” / 517
- “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 518
- “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 519
- “大理寺少卿刘天成家藏本” / 520
- “御史刘锡嘏家藏本” / 521
- “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 522
- “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 525
- “庶吉士卢遂家藏本” / 528
- “两淮马裕家藏本” / 528
- “编修闵惇大家藏本” / 546
- “监察御史孟生蕙家藏本” / 547
- “侍讲学士彭绍观家藏本” / 548
- “礼部主事任大椿家藏本” / 549
- “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 550
- “给事中邵庾曾家藏本” / 552
- “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 553
- “大理寺卿王昶家藏本”或“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 562
- “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 565
- “吏部侍郎王杰家藏本” / 567
- “编修王汝嘉家藏本” / 568
- “工部侍郎汪承需进呈本” / 569
- “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或“刑部郎中汪启淑家刊本” / 570
- “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 582
-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 590
- “赞善韦谦恒家藏本” / 604
- “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 605
- “编修吴典家藏本” / 608
- “编修吴寿昌家藏本” / 609

“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 610	
“监察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 619	
“检讨萧芝家藏本” / 620	
“翰林院孔目熊志契家藏本” / 621	
“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 623	
“监察御史许宝善家藏本” / 625	
“编修严福家藏本” / 625	
“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 626	
“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 629	
“刑部员外郎张道源家刻本” / 630	
“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 631	
“通政司使张若淳家藏本” / 633	
“吏部主事张慎和家藏本” / 634	
“侍讲张焘家藏本” / 635	
“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 / 636	
“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本” / 638	
“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 638	
“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 646	
“编修周厚辕家藏本” / 648	
“江苏周厚埈家藏本” / 649	
“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 656	
“编修邹炳泰家藏本” / 662	
“编修祝德麟家藏本” / 663	
“庶吉士祝堃家藏本” / 664	
“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 665	
“编修朱筠家藏本” / 672	
“编修庄承钺家藏本” / 676	
附件:《总目》著录各家藏本一览表 / 677	

第一部分
古文献及文献家丛考

隋炀帝与藏书事业

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暴君时,会首先提起秦始皇和隋炀帝二人的名字来。其实,这两位君主在某些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就很不一样。人们对秦始皇的印象之所以坏,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因为他实行过“焚书坑儒”的政策。说他焚弃了所有的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焚书令”明明规定只焚烧“非博士官所职”和诗、书、百家语,而“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在不焚之列的。萧何入咸阳时,明明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大夫等官府藏书。直至西汉末年,这些藏书还专藏在石渠、天禄二阁。尽管如此,秦始皇毕竟实行过“焚书坑儒”的政策,对中国藏书事业是一次严重打击,极不得人心。故在中国 2000 多年来的历史上,人们无不切齿唾骂“秦火”。

而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比,完全不是一类历史人物。他是一个对中国的藏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旧唐书·经籍志序》说:“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图谱略》里说:“隋家藏书,富于古今。”《宋史·艺文志》序说,隋炀帝时“藏书之富,冠绝往古”;明代学者胡应麟在《经籍会通》里提到,“隋之书籍”,“盛绝古今”,“书契以来,特为浩瀚”。这都是后人对隋炀帝推动发展藏书事业所作的伟大历史贡献的颂扬之辞。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隋王朝藏书事业快速发展的史实,就会发现这些颂扬之辞是有历史根

书林丛考(增补本)

4

据的。在评价隋炀帝这个历史人物时,我们不应忘记他的这一历史功绩。

一、关于隋初对藏书事业的恢复

在叙述隋炀帝对促进中国藏书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之前,有必要先述及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对恢复中国的藏书事业所作的努力。因为隋炀帝杨广是不可能凭空发展隋代藏书事业的。其父亲恢复隋王朝的藏书事业为尔后炀帝进一步推进发展藏书事业创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自商周以来,历朝历代已形成了重视藏书事业的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长久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使我国的藏书事业已粗具规模,藏书量达13000余卷。尔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迄于隋,收聚藏书、校书编目的活动都连绵不辍,到西晋荀勗校书时,藏书量增加到近三万卷,比西汉增加了一倍多。南北朝时,不分南朝或北朝,也都有过藏书、校书的活动,但因分裂割据,战争频仍,使藏书事业几经恢复又几经焚弃。此时的藏书不但数量大减,质量也很拙恶。到隋初,隋王朝从北周朝廷接收下来的藏书仅15000卷,比西晋减少了一半,恢复藏书事业就成了摆在新王朝面前的一件大事。

隋初恢复藏书事业的举措,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接收北周和陈朝的藏书。《隋书·经籍志序》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北周原有万卷藏书,加上从北齐藏书中挑选的5000卷,总共应为15000卷左右。开皇八年(588)冬,文帝派儿子晋王杨广等作行军元帅,统帅50万大军越过长江天堑,攻打南方的陈朝,翌年初就一举讨平了陈王

朝。在隋军攻破丹阳城时，晋王杨广命令战将裴矩、高颀“收陈图籍，归之秘府”（《隋书·裴矩传》）。《隋书·经籍志序》说：“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陈朝的藏书全部运到了长安秘书省。虽纸墨不精，书亦拙恶，却扩增了隋初的藏书。

第二，隋初恢复藏书事业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接受牛弘的建议，在全国开献书之路。

牛弘，字里仁，开皇初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是朝廷主管著作和藏书事业的重要官员。他少小笃志于学，平常手不释卷，在朝中是一个威望很高、学识渊博，受到隋文帝父子信任的大臣。

牛弘在秘书监任上，“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这篇奏文是中国古代文献事业史上的极珍贵文献，奏文大致谈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阐述书籍产生的历史和藏书事业的重要性。他说：“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爰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二是备述自孔子以后以迄于隋，历代藏书事业累兴而又累厄的历史。他历数了“五厄”，即一厄于秦始皇焚书；二厄于两汉之交，“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三厄于东汉末，“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四厄于西晋末，“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五厄于梁元帝萧绎在荆州兵败于北周，公私典籍七万余卷，“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三是陈述本朝藏书事业的现状及使之恢复的急迫性。他说：“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

书林丛考（增补本）

6

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监，少垂照察。”加之此时另一位重臣、大宗伯、上开府、潞州刺史柳昂亦上表“劝学行礼”，敦重文教，也影响了文帝。

于是，在开皇三年（583）三月，文帝接受牛弘建议，“诏购求遗书于天下”（《隋书·高祖本纪》），“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书·经籍志序》）。因当时既“勒之以天威”，又“引之以微利”，分派使臣督促各地向民间搜聚书籍，献书之人是很多的。《隋书·儒林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学者刘炫聪明博学，与刘焯时称“二刘”。但官运不亨通，“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一生穷愁潦倒。当时朝中“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为解决生活困难计，“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被人告发，差点被杀，幸获赦免。可见当时献书之热于一斑。通过这次搜书于天下，“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牛弘也因此被进爵为奇章郡公，食邑千五百户。

第三，派人进行校书、编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旧唐书》均著录了《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牛弘撰。这是牛弘任秘书监时所编之目，当以接收的北周书为基础。《隋书·经籍志》又著录了《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未题撰人。这当是开皇三年搜书以来至平陈之前所编书目。

平陈之后，隋初朝廷藏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北周之书、南陈之

书、开皇三年以来所搜之书。当时书籍质量不高,无暇校写,残缺散乱的情况是难免的,亟待进行一次校书编目整理工作。《隋书·经籍志序》说:“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霁、南阳杜颢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

这次校书是以秘书丞许善心、著作佐郎王劼为主进行的,一直进行到开皇二十年,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校书。当时参加校书者,有刘焯“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隋书·儒林传·刘焯》);李文博开皇中,直秘书内省,“典校坟籍”(《隋书·李文博传》);萧该“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隋书·儒林传·萧该》);许善心“又追奏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隋书·许善心传》)。按上所引,当时参加校书的有十几名学者。二是写书。许善心等召天下工书之士于秘书省内“补续残缺”,配齐了正副二本,藏于宫中供御用,其余的藏书以充实秘书内外二阁。这时藏书单本已达三万余卷,短短20年工夫,藏书量增加了一倍。三是编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王劼撰。这部书目当是这次许善心、王劼校书的产物,仅署名王劼,而无许氏,那是因为许善心撰另一部在编目录学名著《七林》。许善心字务本,《隋书》本传说他“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诵记,多闻默识,为当世所称。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仕陈为通直散骑常侍。入隋后至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参与领导秘书省的校书工作。《隋书》本传说:“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许善心《七林》虽仿照阮孝绪《七录》,但优于《七录》。《隋书·经籍志序》批评《七录》“割析辞义,浅薄不经”。而《七林》既有总叙,又能“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继承了汉代刘向《七略》的优良学术传统。可惜《七林》很快被佚失,《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